

内 容 提 要

《孤独的人群》一书曾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同事的协助下完成的一部经典学术著作。

本书主旨是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演变。作者根据传统导向、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社会性格类型对具体的社会阶层——美国中产阶级的性格形成和演变进行了全面阐述。理斯曼认为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而社会性格最终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娱乐、政治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活动中表现出来。

作者着重探讨了 19 世纪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内在导向性格如何被 20 世纪中叶的他人导向性格所取代的过程，研究了这一取代的原因、过程以及对美国当代主要社会生活领域的影响。

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掌握美国人的心理动态和人际关系特点，对研究美国人的性格变动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摇孤独的人群 〔美〕大卫·理斯曼等著 王 崧 朱虹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

搖陽昇苑 猿緣 園藏 願 愿

摇Ⅰ援孤援~~援~~摇Ⅱ援①大援~~援~~②王援~~援~~③朱援~~援~~摇Ⅲ援中等资
产阶级-研究-美国摇Ⅳ援~~援~~论~~援~~论~~援~~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5290 号

搖◎ 员怨员遭曾再薩蒙战番讓囉贈孕初葉

摇精製糖漿() 購藥營業員恩以豐贈海軍堂研藥奉蔡援

搖悅藥業

搖故重製與增刊彙錄[◎] 國語粵造書彙編彙錄增刊

摇图字: 元 圆 员 猿 号

丛 书 名 摇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摇摇名摇孤独的人群

原著者摇〔美〕大卫·理斯曼等

译者 王 瑶 朱虹

出版发行摇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摇摇址摇南京市汉口路 圆号摇邮编摇圆缘园猿

电摇摇话摇园缘缘缘缘缘缘缘园缘缘缘缘缘缘传真摇园缘缘园缘缘源苑

网摇摇址摇澳赉:轱蕲蕲葵火蹀蕲蕲蕲

电子函件揺怱怎贲淨員岳赧遣置韻援捌慨译社

经摇摇销摇摇全国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摇摇阜宁人民印刷厂

开摇摇本摇摇愿参伊元愿摇摇员猿圆摇摇印张 员员摇摇缘摇摇字数 圆苑千

版摇摇次摇摇第 员月第 员版摇摇第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摇摇数摇员—猿

陽月 瑶苑 猿緣 園藏 愿員 愿稅 員員

定摇摇价摇摇员圆元

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摇*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序 言

1955年秋,在国家政策研究会(悦信通娱社最精彩名篇)的赞助之下,我有机会去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讲授社会科学课程。在此期间我是文化与人格开发这一交叉学科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该学科除了包含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外,还涉及其他许多相关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我的同事们和我一直期望开设这样一门跨系别的社会科学综合课程,这其中包括与我共事多年的老友戴尼。戴尼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文艺批评和人文科学的角度研究大众传媒。在耶鲁大学的最初几个月,我吸纳了格拉泽为研究小组的新成员。格拉泽的代表作《评论》(悦信通娱社最精彩名篇)一书中关于“人的研究”的章节,表现了他对社会科学敏锐的批判力。我的同事和我为撰写《孤独的人群》(裁察录增例赠)和《大众的面孔》(云精圣山察悦赠)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直至今日,回想起著述《孤独的人群》一书的早期准备工作,我尚不禁为自1955年以来,美国知识界和学院生活的巨大变化感到震惊。这些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和世界格局的宏观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科学自身的必然发展。

二战前,我是一名专门研究诽谤罪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法学教授。我试图了解某些西方国家中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身

员

攻击和政治谩骂的不同含义。^[奥]同时我为自己在研究公众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在我看来,公众舆论不但是解答诽谤问题的手段,更是了解广泛意见的渠道。事实上,自猿年代选票统计采用系统方法以后,学生的社会作用更趋于没有发言权和没有权力。为了更深入细致地了解这一现象,我引用了在应用社会研究局和国家舆论研究中心东方办的几位朋友的研究成果。格拉泽先生和我收集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关于政治观察的交往过程的,我们想了解“我不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圆]

二三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普及和繁荣。当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发展极为迅速,如同公众舆论一样吸引了我们的研究兴趣。

劳伊德·沃纳在探索当代各类社团方面开创了新纪元。二战以前,大多数人类学家在学院没什么地位。他们所收集的资料主要来自于那些没有文字、没有海军、一般意义上的所谓没有“文化”的原始群落,因而并不过硬。此外,人类学家们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孤身探险,观察原始群落的艺术、经济、神话、子女教养、法律制度和血缘关系,再加以整理和概括。人类学初创时期,人类学家只能孤身探险,原始群落的条件也不尽人意,有可能已受到文明的影响,不能保证原始如初。不仅如此,早期的人类学家也不免有些武断和主观,就像早期精神分析学家那样,在论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得出结论。实际上,他们的工作是一种运用观察和记录能力的艺术活动,要求具备丰富的想像力和自信心。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和乔夫里·乔雷尔等人类学家就具备这些能力,这些勇敢的探索者在二战的影响下,试图从总体上解释和把握美国人、日本人和苏联人的民族性格。

他们的研究成果刚一发表,立刻招致许多人接二连三地

批评,包括他们的方法、概念以及解释上的缺陷。同样,《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也遭到了类似的,甚至是更加无情的批评。^[1] 尽管存在着上述批评,但民族性格、文化与人格领域的研究仍在进行,当然,研究更加注重精确化。年轻一代的人类学家似乎有意避开较为棘手的、似是而非的问题。目前,人类学家不再被称作专门探索其他鲜为人知特性的“神秘的精英人物”了,过去的神秘事物如今已成为常识。当代的人类学家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素养,承担更繁重的观察和分析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在当年是单个探险家所无法胜任的。

与此同时,某些精神分析学家也开始了跨文化的研究。或许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涉入,最有力地刺激了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研究人格和文化问题(或者如克拉克霍恩和默里所说的文化中的人格)。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理论,再经过阿伯拉海姆的完善化,把口唇型性格和肛门型性格运用于整个文化分析中,把生物学的普遍性看作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相比之下,我们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所论述的则主要是历史问题,较之性心理的范围更宽泛,而比人类命运的问题狭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本人处于新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尤其深入研究过弗洛姆的思想,他在其两部著作《逃避自由》和《为自己的人》中,尝试把社会学倾向的精神分析性格运用于历史变化中。精神分析学家像人类学家一样,十分关注从前被人忽略或没给以恰当解释的重要事实,如梦、儿童游戏、无意记忆、断奶的方式、广告的象征内容、流行的故事和电影等。当然,历史学家也把这些当作研究的素材。精神分析学家在探讨文化时,将儿童性格结构的特殊类型与成年人社会的生产方式、爱、战争及民间传说联系起来。在整个精神分析的工作中,他们关心现象的前后联系和事实,探索人类性驱力和攻击驱力的疏通过程,由此启发了某

些历史学家。^[源]如在精神分析的启发下,理查德·霍夫斯特根据形态和风格思考历史问题,既描述历史事件又刻画历史模式(当代历史学家在“浪漫主义”时期,也曾如此作过)。由于精神分析学派在各种个人动机和宏观社会形式之间建立了更为广泛、明确的联系,因此,精神分析对历史学家的影响很大。

弗洛伊德对待资料的态度是傲慢的,他的一些正统的弟子尽管并不具备弗洛伊德那样的天赋,也效仿这一顽习。其他的精神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则顺应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对于仅仅从个案中得出的结论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不急于将结论普遍化。他们认识到,若要了解社会,仅仅掌握个人生活史还不够,还需要了解社会历史。^[续]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假定自己已经了解了特殊文化的基础或基本要素,并假定人的命运在儿童时期的性心理体验中就被确定。而我认为,这种假设不仅过于轻率,而且根据不足。《孤独的人群》强调青少年时期的同侪群体和学校对于性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即便这有可能低估了成年人的经验在改变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虽然《孤独的人群》总体上更重视从传统导向到内在导向,再向他人导向的特定历史发展,但我们并没有忽略心理顺承性。本书第三编我们着重讨论了心理顺承模式,如自主性、顺承性和精神颓废,而历史或文化的顺承模式退居次席。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任何社会发现不同类型的心理顺承。^[远]然而,正如我们在后文中指出的那样,许多读者因此而忽视历史的和普遍的因素,把自主性和内在导向相提并论,事实上,顺承性存在于各个社会,并非是他人导向性格独有的特点。无疑,我们所重点讨论的顺承性,如顺承、调整、偏离、颓废等,是高度分化社会存在的某些问题的集中反映。一般说来,精神分析的性格类型学(以卡汀纳为代

表)是从个人出发,从而接近社会的。《孤独的人群》选择了另一条途径:以工业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为起点。我本人更关心社会上层阶层,尤其是那些被称为固定薪酬的“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我们假定,当旧的以生产和工作为特征的社会功能丧失生命力后,以消费和人际关系为特征的新社会结构出现,则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性格类型,但我们并不认为个人是其社会角色的复制品。我们假设,在追求个人成就和社会体制要求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大的冲突,在冲突中个人不仅不觉得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反而认为是体制的异化物。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未解决个人内部的心理机制问题。如果性格分类只是为了便于理解社会的总体变化,那么个人内部的作用就是多余的了。心理学家很容易出于理解社会变化的目的而把个人加以分类,譬如人们常说某人是口唇型或接受型性格,或者是施虐-受虐狂,并认为与之相关的一切属性就是个人真正具有的性格特点。事实上,我们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把特殊的个人分为纯粹他人导向型或内在导向型,当我们进行划分的时候,目的是想澄清他的社会或职业的角色,而不是论述这以外的什么东西,我们在划分某人性格类型的时候并不是作为他的一个朋友论述我们所了解的东西。虽然我们奉劝读者在阅读《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时,尽量避免上述误解。但许多读者包括某些社会学家不仅认为把人分为纯粹的他人导向或内在导向切实可行,而且还激进地得出结论:《孤独的人群》中关于社会性格的尝试性的假设可以加以明确的定义并能够得到证明。^[1]

这样一来,最复杂、最模糊的美国人性格问题,在这些人眼里,变成了明确而简单的问题。可以想像,如果读者和大众都以这种态度对待本书中的问题,他们就会认为社会科学不

过是雕虫小技,只从事细小而繁琐的研究,社会科学精确的方法折射了社会学家的迂腐。当怀着不是去阅读一部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社会科学著作的态度去重新读一遍《孤独的人群》之后,我发现,书中有许多地方我还是急于概括了。现在我不愿等待更多的事实来证明它们(我只接受最主要的批评并弥补主要的不足,至于那些小的毛病只有在这本书重新改写时才能做全面的修改)。在此,我要强调,没有许多前人的研究及我们对他们的资料和解释的引用,《孤独的人群》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希望,作为回报,该书能够为这方面问题研究提供参考和有所启发。总而言之,《孤独的人群》的作者在社会科学方法上是多元论者,既赞赏笼统的、甚至有些古老的著作,也引用新的、更精确的研究,我们对于观察技术和采访的兴趣就反映了我们的后一种倾向。

我们已经指出,读者中有人把内在导向等同于自主性。因此,只有一小部分读者热情地赞赏他人导向的价值,欢迎他人导向的开朗、缺少克制以及对他人的兴趣和灵活性。很有可能,《孤独的人群》对于他人导向的价值强调不够。无论如何,在过去 15 年中,绝大多数读者已经深信:内在导向的人比推销自己的他人导向者更可取,因为内在导向者在商品化上并未面临什么问题,倒是那些四处推销自己的他人导向者遇到的问题更多一些。^[10]

一般说来,从自由贸易转向社会党人立场的人都会反对顺承性,例如,当格兰海姆征询学生们的意见,问他们是否愿意以色列人农场迁到他们的居住区时,那些典型的他人导向型的学生不但不反对,恰恰相反,更愿意倾听以色列人农场迁移的理由。

性格结构及其行为表现之间的差异至多是一个暗中的差异,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是一对抽象的概念。正如本书及其

姊妹篇《大众的面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个人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任何特定的时候,那么任何人都不完全属于他人导向或内在导向。所以,虽然根据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的程度对人加以比较是一项有趣的工作,但这一工作很难取得确切的结论。那些主张用这种性格特性测量所有公民的人往往把问题简单化。殊不知,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应当走在测量和比较的前面。

本书第一章引用托尔斯泰的著作和全书散见的托克维尔(托克维尔 法国作家、政治家。——译者注)的语录说明,我们十分关心他人导向型是否是全新的性格类型。李普赛特教授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1]中有力地指出:根据欧洲访美学者的报告(包括托克维尔),可以认定美国历来是他人导向的,这是没建立过等级制和具有强烈的人人平等及机会均等观念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心理结果。当我们写作《孤独的人群》一书时,我们遇到了许多历史资料方面的困难,如我们对于 1831 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宗教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何实际意义就不很清楚。我们通过神学争论和信仰复兴运动收集到教徒活动及教会成员的某些资料,但我们对于当时男人和女人、大人和小孩、上层及下层阶级以及新、旧教派的宗教感情等,尚不能把握。我们只能推断,19 世纪的年轻人面对 18 世纪中叶年轻人的所面临的问题时,大体上会怎样回答。事实上,我们在《孤独的人群》和《大众的面孔》中只能寻找可以代表 19 世纪一般年轻人的典型的某些方面,由于地区和职业的关系,这些人未曾直接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也没做好进入新中产阶级和富裕社会的准备。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在变化了的环境下仍想保留传统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改造。

如果我们把美国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与不发达的南美洲、亚洲或非洲文化相比较,我们则会同意李普赛特等人的主张,即认为今日之美国与 1600 年前的祖先相比依然十分相似。即便托克维尔还活在世上,他也会承认,美国(南方除外)缺少封建传统,没有强烈的宗教信仰,也没有广泛的家庭纽带关系。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顾及眼前利益。总体上说(南方除外)他们在地域和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升迁方面有大量的机会,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孩子、城市和国家持乐观态度。正如马提纽(马提纽,英国作家。——译者注)访美期间观察的那样,在美国,父母似乎是孩子们的囚犯而非主人,父母对孩子十分尊敬,采纳他们的好主意。我认为,我们不应把这一判断理解为 18 世纪美国人教养孩子的行为是以孩子为中心的,而应解释为美国的孩子比欧洲的孩子还要小的时候,父母就鼓励他们独立自主,因此,他们较有主见。

当然,历史的变化并非一蹴而就的,我们可以在 18 世纪,甚至更早一点,发现所谓他人导向的前身。但我们不能说,只有他人导向的出现,人的顺承性才开始考虑他人的好建议。实际上,美国人总是在寻求合理意见,如果没有更优秀的人或其他人的肯定,他就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他人导向(虽然这一概念本身未能完全体现出来这一含义)意味着对于自我的重新定义。他人导向的人渴望被人爱胜于渴望获得尊严,他不想愚弄、压抑和迷惑他人,而是力图与他人建立友谊。他不想被人看作是势力眼的人,想与他人交流情感。他真诚坦率,从不遮掩自己。

在现代自我意识的社会中,^[1]许多《孤独的人群》的读者一味强调他人导向性格的消极面,忽视其积极的一面。然而,我们——《孤独的人群》的作者——不想回到崇尚爱默生(爱默生,美国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译者注)式的个人主

义狂热理想的时代。^[1]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爱挑剔的、不惹人喜爱的人才会对他人导向者身上的良好品质，如替别人着想、敏感和宽容、视而不见。今天，教养良好的美国年轻一代梦想比祖先们从生活中获取更多的东西，虽然在多重选择中他们也会对是非标准产生怀疑，但安全感和富裕使他们追求高雅的生活格调，而不单单是填饱肚子。教育、人口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促使人类的同情心不断地扩大，超越了种族、阶级，甚至超越了国界。也就是说，人们不仅对于周围的同类给予极大的关注，无论是在自己所处的阶层还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都愿意承认同类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地位。今日美国，有钱人的问题主要是他人的问题。由于他人在数量和个性化方面远远超过了从前，人的社会和心理的前景就变得无限远大。而自然、宇宙、神等形象作为陪衬退居到背景中或干脆消失不见了。人的性格有这样一个特点，性格的某些方面越是突出、明显，其他的方面则越会暗淡无光。

内在导向和他人导向概念常常用来直接表示社会状况和社会性格，其有助于我们分析相关的历史发展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不断地分解、消亡，让位于新的组合，就像美国的政党既把人们的利益分散开，同时又将其聚集在一起。同样，我们曾冠之以内在导向或他人导向的某些行为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划分了。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上中产阶级的子女在学校里注重享受，学习不用功，而据科利和斯普尼克等人的研究，今天，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里又变得遵守纪律、刻苦攻读了。此外，根据最近对加利福尼亚州的调查，低层中产阶级更喜欢使用时髦的和顺承群体的语言，上层中产阶级则对此不屑一顾。

《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所使用的社会性格概念，试图囊括

当代社会中较为重要的社会群体,因而不同于民族性格或众数(自变量)性格,后者通常是指群体或民族中性格倾向的集合概念。我们只对于一部分特殊人性格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并且主要关心这些方面的变化。但是,我们对于人的性格、行为、价值观、特殊社会制度的特点和精神面貌(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刚刚起步)的差异并不十分重视。在写作《孤独的人群》过程中,我们深信历史、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古老的学科对理解社会的变化已变得并不特别重要。只有利用心理分析的心理学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社会的变化。即便如此,我们在本书中仍然强调社会性格,同时也强调当代世界主流社会体制,并认为社会体制不是刻板的父母注入儿童梦想的固定形态。然而,自本书出版以来,整个世界局势使我们更加确信,当代工业社会孕育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性格,我们看到,当代日本的社会体制非常富有生命力,无需二三十年就可创造出一代新人,日本人的一言一行都比其社会性格的变化更为迅速。^[1]

任何巨大的社会形态,为了保持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总要孕育出各式各样的社会性格。例如,如果美国是法西斯主义国家,它就会孕育受虐或权威主义的社会性格。在美国北方许多具有这种倾向的人被送到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在南方则恰恰相反,这种人在南方的群体中可以竞争县司法官。当然,社会体制的法律制度使这种人很难从事政治活动。一旦性格不良的人掌握了政治大权,人的自由就会遭到践踏。在此,我们重申,社会体制在较宽泛的范围内孕育了一种适合社会的个人性格。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人们行为反应的可能范围内,社会体制可以选择某些反应予以强化排斥和过滤掉那些有损于社会的、更具个人冲动性的反应。社会体制一旦形成了(正如鲍丁在《纽约的革命》一书中指出的,这一体制由组织

者的奋斗所创造),形形色色的人便开始顺承和关切这一体制。卡尔·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时工厂具有巨大力量,工厂榨取了工人的劳动。而在当代,工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的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们自身也开始异化。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后期和社会主义后期的官僚制是一个“铁笼”,人们被囚禁于铁笼中,只能借助享乐主义消沉或颓废,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冲淡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许多社会科学家得出了与上述观点相一致的结论:在当代世界,个人和社会性格作为“生产的因素”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为了真正地解释社会,不仅需要探索人的动机,而且要意识到,各种不同的人面临的社会体制是非常相似的,当代各种科学技术的力量、经济组织、意识形态和政党组织的力量都非常相似,以致于世界各国有可能形成同一风格的社会体制,即一个有赖于官僚制度和生产大量商品的社会体制;一个以提高国家威望或力量、改进生产条件为宗旨的社会体制。许多美国人包括我们在内,不愿接受这类决定论式的看法,认为人们有能力干涉或解决体制的弊端。我们并不否认,由少数有明确目的的上层人物所控制和创造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权力分散、生活单调的民主制国家的社会体制相比,存在极大的差异。

经过再三思考,我们仍坚持认为,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性格并非绝对不可沟通。

人们的可塑性很大,可以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工作和生活,但我们不应夸大这种可塑性。美国的印第安人不能成为好奴隶,非洲的黑人则可以,这不仅因为(正如爱金斯在《奴隶制》一书中指出的)奴隶身份破坏了非洲黑人的精神并摧毁了他们的文化内聚力。在历史上,美国的西班牙移民确实曾消灭

西部的土著印第安人,并从国外输入顺承性更强的奴隶取代他们,这些奴隶具有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顽强生存的社会性格。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佩布罗族印第安人比其他部落的印第安人更坚强,更具抵抗性。同样,美国的移民史也反映出不同源流的文化对类似的社会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移居美国的日本人,其第二代就开始追求接受高等教育,而美国的中国移民的第三代仍然在开洗衣店和小旅店。纵观各国移民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到了第三代或第三代以后,他们才开始彼此往来。在历史上,除了个人的重要性及其特殊的性格以外,独立于社会体制的社会性格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孤独的人群》中所指出的,不同的社会性格可以在同一社会制度下服务于同一工作,但是,当与性格和工作性质相一致时人们产生的巨大能量相比,性格类型与工作性质的格格不入可以导致人们的消沉与颓废,其代价是高昂的。

这并不是说,那种认为在致力于现代化的同时仍能保持其独特文化或民族传统的观点是正确的。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就持有这一错误的观点。正如许多人深刻意识到的那样,这些领导人实现现代化所使用的方法往往会转变成为目的本身,所以可以预见,最终各种具有不同社会性格的人将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废弃历史悠久的本地宗教和本国文化。然而,传统的价值观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要反对各种新技术、反对人的富裕和力量(有时它的矛头指向垄断新事物的人),拼命维护旧制度。为达此目的,传统价值观不惜破坏新的社会制度、维护古老的社会性格。如果大同世界是人类的最终归宿,人们可以像许多科学幻想小说家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所说的那样发明一种“可塑人”,从而代替20世纪的经济人,同时也可避免社会科学中棘手的人的问题。

我们也许确实要迎来人类的大同世界。但是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果真有幸活着看到这一世界,我们将发现,可塑人仅代表着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性格类型和朝气蓬勃的大同世界中更独特的个性化性格之间的历史发展阶段。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上传导向的时期(见本书第十二章),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格较为固定,群体的冲突常常反映着人类一般种族的延续和特殊种族的延续的相互矛盾。当然,这样说未免抽象。这些群体彼此相互学习,但并不想模仿对方或成为对方。后来在西方历史上(或许世界上其他国家历史上也是如此),产生了做事效率极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内在导向型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给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以征服世界的力量,使他们具有世界人口中最强悍的体魄和力量。17世纪荷兰舰队司令菲利浦退休在家写回忆录时吹嘘说,只需 2000 官兵即可征服中国。^[1]

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我们无意于解释内在导向的社会性格是如何产生的,因而,我们遵循马克斯·韦伯的教导,认为清教伦理观不是联系古希腊理性道德与当代西方基督教道德的中间环节。我们认为家庭在培养性格方面很重要,尽管家庭并不能完全说明许多内在导向者性格形成的内部机制和复杂的过程,但核心家庭有可能将子女培养成为与父母具有相同性格模式的人。在进一步研究内在导向性格如何产生及其为何消亡之前,我们必须进行历史的和跨文化的研究。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推测,随着个人使命感的减弱而产生的内在导向性格之衰落,应部分地归咎于社会体制的强有力变化,对于这一变化,内在导向者是能够明察、描述和不得不附和的。社会体制发生变化的表现之一为:到了资本主义后期,自由市场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而且影响了个人的自我推销术(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使用的“市